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冯契，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史家。作为哲学史家，他的兴趣在于中国近代哲学历史的研究。从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述中，我们可以体悟到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把握；二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考；三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

关键词：冯契；哲学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

冯契，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史家。作为哲学史家，他的兴奋点实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哲学历史的研究，他的最精彩的论著莫过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从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述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而且还可以体悟到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两者相比，就笔者的感受论，后者可能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在这里仅就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和心得。这些感受和心得概括起来有三：一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把握；二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考；三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

一、“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1] (P344)}这是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一个基本点。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的论文，专门来谈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在他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绪论中，也突出地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述。

冯契很重视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哲学史的研究。这一点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但如果细读这两部可作为兄弟篇的哲学史，又会发现其间的不尽相同之处：前一部哲学史讲问题，更着重于哲学史的逻辑的一面；后一部哲学史讲问题，则更强调哲学史的历史的一面，且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史与中国近代文化历史大变迁的联系。

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哲学尽管是在古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与交汇中发展起来的，具有由古代哲学转变为近代哲学的革命意义；但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特别是在主要哲学问题上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体现了哲学史的内在的逻辑进程。他十分重视这种哲学史的内在的逻辑进程，认为这种哲学史的内在的逻辑进程在中国哲学历史中是通过它所特有的问题而展开的。他指出：“中国哲学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独立发展，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民族特点。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2] (P14)}具体地说，中国古代哲学环绕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开展，集中表现在天人之际、名实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四个重大问题上。中国近代哲学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具有近代特色的思考与论争。

但冯契更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不仅仅为这种历史连续性所规范，而且还深受时代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哲学史上所原有的，而且还有来自时代的提问。他认为，哲学史作为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辩证法，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实践。“所谓根源于社会实践，是说社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社会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政治思想斗争这一环节来实现的，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自然科学这一环节来实现的。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它们统一于社会实践。”^{[3] (P3-4)}他又对社会实践对哲学的根源性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具体分析，认为：“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在革命的时代，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影响更显著一些；而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科学的进步与哲学的关系就显得更重要一些。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着重考察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而制约着哲学的发展。”^{[4] (P4)}因此，冯契根据中国近代的时代特点，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家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不只是一定要回答哲学史上原有的问题，而且更要回答时代的提问。

时代向中国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冯契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关于‘古今中西’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5] (P4-5)}因此，冯契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是革命家，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的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6] (P6)}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其所以为特殊问题，因为这是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所不曾面临过的。其所以为根本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贯穿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程，并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对历史观、认识论等问题的回答。冯契说：“在中国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论争，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的。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哲学革命就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7] (P7)}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十分重视把握“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问题，以此为纽结来考察和揭示中国近代哲学的展开。这是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与他的古代哲学研究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

冯契的这一思想是富于启发性的。他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哲学史上的两种提问方式的问题：一种提问方式是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开展所致，另一种提问方式则是哲学发展为文化历史影响所致。由于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深刻影响，在哲学的两种提问方式之间，长期以来哲学史家们往往更为关注前者，而不太关注后者，甚至认为后者的一些内容根本就不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把它们摒弃于自己的视域之外。特别是一些以西方哲学为各民族哲学发展唯一尺度的研究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以西方哲学的尺度去裁量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为这些直接来自 19-20 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最多只能算是思想问题，似乎只有谈康德、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才算是谈哲学，而谈孙中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就不算是谈哲学。这就使得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总是停留在纯粹的哲学范围里，而不甚关注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的提问及其思考，缺乏由形上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兴趣。其实，这些哲学问题同样是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同样是可以而且应当成为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问题进入到哲学史研究中，哲学史研究才能保持同人的文化历史、同人的生活世界的更为密切更为鲜活的联系，才能保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根性，也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特别是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百年之间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上下求索，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无数足迹。当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功地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去回溯这些思想足迹，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其意义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过，更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纯逻辑的东西，但却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自己激动人心的地方，有自己值得哲学史家认真研究、反复发掘的思想底蕴。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应当关注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中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进程的哲学问题，关注这些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一个如何看待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且还深刻地反映了哲学史观的不同。

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

冯契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一以贯之的传统，而中国近代哲学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同时，冯契又指出中国哲学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迁，中国哲学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继古代传统之后而形成了近代传统。他由之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两种传统的理论。

在冯契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变迁性，有一个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转变。他不同意把中国文化传统仅仅看作是属于在古代就已既定而永远如此的东西。他说：“一谈到传统，人们往往就想到古代传统，如说，中华民族有 5000 年文明史，自孔子以来有 2000 多年的儒学文化传统，我国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儒道两家（或儒释道三教）相互作用的历史，等等。不错，我们有悠久的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生活中依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注意的是自 1840 年以来 100 余年间形成的近代传统。”^{[8] (P511-512)} 在这里，冯契明确地强调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的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因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影响的，是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

具体到作为中国文化精华的中国哲学，冯契认为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转变。他反复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9] (P513)} “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 20 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0] (P608)} 在这里，冯契强调这一哲学传统的转变不是一种量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因此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他说：“‘变革’，那就是说，哲学思想、哲学范畴在这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11] (P608)} 而这种新的近代哲学传统，在冯契看来，既包括了思想成果，又包括了理论不足。他说：“哲学革命已取得重要成果（特别是历史观和认识论领域），但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待后人去解决。如逻辑和方法论、自由学说和价值论，近代哲学家虽作了许多探讨，却未曾作系统的总结：智慧学说（和本体论相联系着）也是薄弱环节，而鲁迅对‘国民性’的分析批判则几乎被遗忘了；等等。哲学革命还在继续着，而近代的传统（不论是成果，还是遗留问题），都明显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哲学思维。”^{[12] (P513)} 在他看来，这种近代哲学传统有其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但不论是其成果还是其不足，都是有着深刻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的。

正是这样，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中，特别重视把近代哲学传统发掘出来。在他看来，这种发掘工作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的哲学范畴取得了新的内涵，二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三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独特创造。他尤为重视第三方面，说：“中华民族历来是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近代严峻的现实条件的挑战，更激发了她的创造性。上述两方面，即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和会通中西，其实质正在于创造。在近代哲学史的各个阶段，哲学家不断提出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推进了哲学的革命进程。而如熊十力提出‘翕辟成变’和‘性修不二’的学说，金岳霖提出‘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毛泽东根据‘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阐明认识运动的秩序等，我以为，都是哲学上的创造性贡献。”^{[13] (P609)}所谓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的形成，正是中国近代哲学家们进行这种独特创造的结晶。

由此出发，冯契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化，必然存在着一种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对于这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冯契也承认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更认为，从总的趋势向上看，从其中的理论成就上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他力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对这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作出鲜明的凸显和总体上的认肯。他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名，即表明了他对于这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的态度。而他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成就与缺陷的衡论，也是立足于此的。

如对于新文化运动，冯契尽管对其激烈反传统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在总体上作了肯定，指出：“新文化运动激化了古今中西之争，加速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步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被某些人视为过分激烈了，但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至于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当然包括多方面的意义，但就哲学的近代化来说，就是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用科学方法取代经学方法，在价值观念上用近代的自由原则取代封建的权威主义。所以，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哲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批判对象和战斗任务更加明确起来了。”^{[14] (P309)}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必然性与合理性，是在两种传统的交替之中显示出来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实是新传统取代旧传统的一种大转变。

又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冯契也有自己的心得。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最近重读了梁启超的许多著作。过去我老觉得此人‘流质易变’，像泥鳅一样难以把捉。现在我比较了解他了。在戊戌变法至20世纪初，他确实是‘新思想界之陈涉’。他那时要求个性解放，鼓吹精神自由，对中国人的奴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文章写得痛快淋漓。后来他退缩了，又老想在政治上实行改良主义，不甘寂寞，不能专心在学术上深入下去，因此作不出什么可观的成绩，给人以浅薄、芜杂的印象。但他在戊戌变法至20世纪初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那时还不到30岁，真是天才！‘道德革命’、‘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等口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宝贵的蕴藏，以后会起持久的影响的。但是，也不必那么气呼呼地批评人搞‘全盘西化’。至于对所谓‘国民性’进行剖析、鞭挞，那正是从‘新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开始的。”^{[15] (P346)}在他看来，从批判旧传统、开创新传统的意义上，梁启超的思想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冯契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的思想，对于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上来疏理和评价19-20世纪中国哲学，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一个时期内，一些学者强调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变迁、特别是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和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认为这种断裂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正常发展，是“反传统”所造成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6]因而对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变迁、特别是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和新文化运动持否定的态度。其所以如此，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只有一种传统的主张，那当然会得出“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结论；而如果用冯契提出的两种传统的观点看问题，则会发现“中国意识的危机”实反映了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由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交替的矛盾性与复杂

性，其中的冲突与论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不是个别思想激进人物活动的结果。可以说，冯契的两种传统的主张，实为衡论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衡论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一新的参照系之提出，是冯契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之考察中国近代文化与哲学发展的结果，其间既具有历史的唯物论，又具有历史的辩证法。

三、扩大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视域

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哲学自身问题的开展外，同时也很重视哲学与其他观念形态之间的联系。通过探讨哲学与其他观念形态之间的联系，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引向一个更广阔的视域，是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冯契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开展的许多领域予以了关注，包括了美学、逻辑学、伦理学诸多领域，这些领域是以往哲学史研究中很少予以关注的。如对于历史上的美学问题，长期以来只是美学史的内容，而不是哲学史的内容。但冯契很重视近代美学的开展以及与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他对于近代美学意境理论的开展作过专门的深入探讨，认为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鲁迅对于意境说最有贡献。他说：“总起来看，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是有成绩的。王国维开始使传统的意境理论近代化，他运用西方的典型化学说来解释诗词的意境，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他有形式主义、脱离现实的倾向，片面地强调了严羽、王渔洋等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以致使后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一讲意境、境界，便是司空图、严羽那一套。王国维以后，梁启超讲趣味，朱光潜讲形相的直觉，宗白华讲艺中之道，他们各自强调了一个侧面。这样，他们把意境理论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使理论内容更丰富了，但同时也都导致了唯心主义。鲁迅批评了文艺脱离现实、超功利的倾向，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艺术趣味的相对性与永久性的问题。他要求在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艺术意境，并强调指出要重视那‘金刚怒目’式的传统。鲁迅对艺术意境理论和典型性格理论，都作了创造性贡献，他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了开拓性的工作。”^{[17] (P304-305)} 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冯契设立了若干专节，用不少篇幅论析了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展。如在第二章第六节中专论王国维，其中设有一小节《美学上的境界说》；在第三章第八节中专论鲁迅，其中设有一小节《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在第四章第四节中专论朱光潜，标题为《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在这部书里，中国近代美学融为了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有机内容。

冯契不仅通过对哲学问题的拓展来扩大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视域，而且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生和发展的文化历史背景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表现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冯契重视时代变迁对于哲学问题域的影响，而且表现为他注意到大的时代变迁中具体的时段、具体的文化历史环境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影响。冯契曾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谈到文化历史的具体环境对于新思想新哲学开展的影响。他在致一友人的两封信中都谈到这一点。在一信中说：“我以为，在中国近代，真正能培养成真实的独立人格的时期和地点却也不多。戊戌时期的湖南时务学堂、同盟会办民报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30 年代上海、40 年代昆明，这些大概是比较利于性格形成的环境。”^{[18] (P358)} 在另一信中说：“我曾说起，像‘五四’新文化运动，30 年代上海，抗日救国民主运动中是能产生真实的性格的。在这样的时期，人们自动地参加革命斗争，不是出于外在权威的命令，不是为名为利，也不是按照一定公式办事。虽然像林冲，也是逼上梁山，但他终究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所以他是个可爱的真实的性格。”^{[19] (P361)} 因此，冯契很重视从具体的时段、具体的文化历史环境来研究哲学史、思想史。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周子东等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一书，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很赞赏该书作者所做的资料工作，称赞他们对近代上海作了深入的了解，说：“本书作者做了很扎实的资料工作，查阅了从 19 世纪末的《西国近事汇编》、《泰西民法志》等罕见文献一直到解放前夕的众多报刊、书籍，并访问了

许多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老同志，所以资料是掌握得比较全面的。”又认为这一研究很有启发性，认为从当年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能学到传播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说：“为什么自‘五四’至三四十年代，上海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有那么大的贡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缺乏经济力量作后盾，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势如破竹，在历次论战中接连取得胜利，迅速渗透到各个学术文化领域，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靠的什么力量呢？不是别的，主要是靠理论和掌握理论的人本身。”^{[20] (P516-517)}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冯契又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从思想史的视域，对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等进行分别探讨。对于这一工作，冯契在一封信中有过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丛书》是由我的几个学生发起组织的，要我挂个主编的名义，计划出 10 种。去年已出版 3 种，我倒是把清样都看了的。这些问题都比较敏感，现在恐怕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21] (P370)}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冯契是赞成扩大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视域，由哲学史研究而进至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更广阔的研究视域的。在冯契看来，社会思想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他在《丛书总序》中说：“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它们所研究的，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或者政治思潮、或者文化、宗教思潮，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但作为丛书整体，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要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在冯契看来，这种研究对于包括中国近代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近代思想诸领域研究，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说：“我们希望借助这种研究跨度和研究方法，提高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多种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注意。”^{[22] (P3)}这表明，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视域，具有一种相当大的开放性，是在不断的扩展之中的。

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视域的扩展，使我们看到，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特别是有一个由哲学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的问题。这一研究视域的扩展，其实不仅是一个研究范围的扩大问题，更是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这一思维范式转换的根本点在于，由哲学史所强调的“思”而转向思想史所强调的“史”。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疏离，使哲学史研究往往更注重哲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而对于哲学与文化历史、与中国思想世界之间的联系则被忽略了，往往只知在纯哲学的思辨中打圈子，而看不到还有许多这圈子之外的来自文化历史、来自中国思想世界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特别是 19-20 世纪中国哲学，更是与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密切关联，更是与这一时代的中国思想世界的各种思潮相呼应相融合，不论是问题的提出、思潮的展开，还是学派的形成、体系的建构，往往都深深打上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印记，受到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的影响。如果只探讨“思”而不看到“史”，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是难以深入开展的。因此，沿着冯契所开辟的研究视域，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的探讨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工作更具有历史感与现实感，就是今日深化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总之，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开展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留下了富有启示的方法论，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 [1] 冯契. 冯契文集(八)[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44、608、608、609、304-305、609、304-304.
- [2] 冯契. 冯契文集(七)[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4、3-4、4、4-5、6、7、309.
- [3] 冯契. 冯契文集(九)[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511-512、513、513、516-517.
- [4] 冯契. 冯契文集(十)[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46、358、361、370.
- [5]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 广西: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6]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M]. 上海: 人民出版社版, 1991. 丛书总序 3.

注释:

1. 冯契:《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2.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3.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4.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5.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6.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7.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8.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史料学简编〉序》,《冯契文集》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版,第511-512页。
9.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史料学简编〉序》,《冯契文集》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版,第513页。
10.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版,第608页。
11.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版,第608页。
12.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史料学简编〉序》,《冯契文集》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版,第513页。
13.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

1997 年版，第 609 页。

14.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 7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9 页。
15. 冯契：《致董易（1986 年 3 月 23 日）》，《冯契文集》第 10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6 页。
16. 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即是其代表。
17. 冯契：《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冯契文集》第 8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4-305 页
18. 冯契：《致董易（1990 年 5 月 11 日）》，《冯契文集》第 10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8 页。
19. 冯契：《致董易（1990 年 8 月 8 日）》，《冯契文集》第 10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1998 年版，第 361 页。
20. 冯契：《〈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序》，《冯契文集》第 9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6 页、第 517 页。
21. 冯契：《致董易（1992 年 8 月 4 日）》，《冯契文集》第 10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0 页。
22. 冯契：《丛书总序》，《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各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丛书总序第 3 页。

The Meanings of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of Fengqi

Li weiwu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Abstract: Fengqi is a Philosopher and 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As 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his interest i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In his studies and works, we can comprehend the revelation of methodology about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of 19-20C. It includes three parts: Firstly, the issues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of 19-20C; Secondly, thinking about the tra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of 19-20C; Last,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y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19-20C.

Key words: Fengqi; History of Philosophy; Methodology

收稿日期: 2006-6-4

作者简介: 李维武, 男,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